1.脱樊笼返自然的晋末大诗人
陶 渊 明

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 405 年）十一月,江州彭泽县(今江西彭泽县)县衙内,年约 40 的县令处理完复杂的事务，清癯的脸庞上带着倦意，回到卧房，长叹一声，脱下官袍，躺下休息起来。

县令还未进入梦乡，一个衙役进来禀报:“大人,郡府派督邮(郡府属官)来巡视了。”

县令睁开疲倦的双眼，不耐烦地说：“知道了,安置在官舍休息吧!”

衙役看看县令,小心翼翼地说:“大人,按规矩,您应当穿好官服,去拜见才对。”

县令翻身坐起,一脸的无奈,对衙役感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吩咐下去,打点行装,我要立即辞职归田!”

这个因不愿卑躬屈膝地求取官俸因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毅然辞职的县令，就是我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最伟大的文学家陶渊明。他不仅以清新的散文著称于世，还写了大量清纯的田园诗篇，成为我国田园诗派的开山祖师。他甘于清贫，躬耕陇亩，坚决不与黑暗的封建政治同流合污的高风亮节，更备受后人赞叹。

了解陶渊明先仕后隐的人生历程，将会大大增加我们对这位伟大诗人的理解与尊敬。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陶渊明(公元 365—427 年),字元亮,入刘宋后,更名为陶潜,自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征士”,东晋哀帝兴宁三年,诞生于江州柴桑县(今江西九江西南)。

由于当时社会重视门阀的风俗，陶家也曾为自己找了一个大名鼎鼎的祖先，即帝尧陶唐氏。此后历代姓陶的名人，也多被拉进陶家宗谱。其实，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不是汉人，也没有显赫的出身，而是湖南武陵的溪族人，靠着武功才逐步成为朝廷中举足轻重的重臣。尽管如此,当时的世家大族仍在背后骂他为“溪狗”“小人”。

陶侃不仅武功显赫，品格也令人钦佩，历史上还留下了许多有关他勤政爱民、励精图治的佳话。其名言“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惜。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的至理名言，对陶渊明自幼树立远大抱负当有很大启迪。陶侃晚年淡泊名利，辞去本兼各职而归老林泉的举动，对陶渊明热衷于归隐田园的思想也有一定影响。

诗人的祖父陶茂,曾为武昌太守,政绩不错;“惠和千里”。

由于不是陶侃嫡宗，到诗人的父亲陶逸时，已家道中落。陶逸虽涉身仕途;“寄迹风云”,但把功名看得很淡;“冥兹愠喜”。(《命子》)这对诗人隐逸性格的形成当有较大影响。可惜，陶逸英年早

逝。

诗人的外祖父孟嘉,也是陶侃的女婿,举止坦率,风雅过人,深得诗人敬佩。

由于父亲早逝，家道中落，虽有父祖留下的田园，诗人自幼生活并不宽裕。其《自祭文》曾说“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常常没吃的),絺绤冬陈”(冬天还穿着葛布的单衣),可见其贫困之状。虽然孤寒，陶家毕竟还算士族，因而诗人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与当时士人沉缅于谈玄论道、脱离实际不同，除了研究老庄学说外，他还认真学习了儒家经典。他读经书，不拘泥于繁琐的章句,而注重其治世修身的理论。“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诗书敦素好,园林无世情”;“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些诗文,正是他对读书生活的美好回忆。

诗人早年所处的时代，正值天下大乱。西晋短暂统一后，便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局面。司马氏政权被迫偏安于淮河以南，而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则逐鹿于中原。江河破碎，生灵涂炭，使东晋政权内的有识之士寝食不安，时刻希冀恢复中原，重建和平统一的王朝，诗人也是其中的一员。诗人 21 岁时,氐族首领苻坚建立的前秦统一了北方。苻坚便率领百万大军南侵，试图一举摧毁东晋。国难当头，素来不和的东晋各种势力，在一代名相谢安的指挥下，团结奋战，在淝水一举击溃了前秦大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使东晋一度有了中兴的迹象。这令年轻的诗人十分感奋，一度为统一天下、建功立业的抱负所激励。他晚年回忆时，仍充满了豪情：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

——《杂诗》之五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

——《拟古》之八

但是，现实并没有给诗人提供实现远大抱负的机会。

淝水大捷后，谢安并没能挥师北上，恢复中原，而是受制于朝中奸臣司马道子，最后被排挤出朝，郁郁而终。昏聩的孝武帝与司马道子之流整日沉缅于酒色，朝政被搅得乌烟瘴气，又回归到以前各世家大族间争权夺势的局面。

碰上这种倒霉的政局，尽管有雄心壮志，诗人却宁肯固守田园“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也不屑与司马道子之徒为伍。

诗人不愿出仕，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背景。自曹魏以来，世家大族(即士族)控制了朝政,孤寒的士人无缘于朝政中枢,形成了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陶侃虽职高位尊,因出身溪族,当时就被人瞧不起,因而与朝中王、谢、庾、桓诸大族不能同日而语。作为陶侃庶子的陶茂这一支，更是逐步没落，与寒族无异了。在这种情况下，陶渊明不可能像王、谢那样的大族子弟，一出仕便能得到显要职位，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诗人决定固守田园，并非完全迫不得已，他实际上打心眼里热爱大自然与田园生活。诗人的故乡柴桑，当荆、扬二州的要冲，是著名的形胜之地。浩浩长江至此分为九派，以更加宏伟的气势滚滚东流。在大江南岸，庐山拔地而起，层峦叠嶂，峥嵘峻秀。庐山的东麓，便是方圆数百里的彭蠡泽（今即鄱阳湖）。朝看朝霞中百舸扬帆，暮听夕阳下渔舟唱晚，真是别有一番情趣。从彭蠡泽泛舟北出湓浦口，便是波涛滚滚的万里长江了。诗人的故居柴桑上京里,是一座不大的山村,襟山带湖,北倚大江“云山烟霭,浩淼萦带，皆列几席间，奇绝不可名状”。诗人从小生活在秀绝天下的青山绿水中，庐山的烟霞，彭泽的清波，湓浦的夜月及平畴的田园牧歌，陶冶出了他恬淡的性格与对大自然的真爱：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田园居》)

少学琴书，偶（语助词）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 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止，自谓是羲皇上人。

——《与子俨等书》

种种原因，使诗人暂时忘却了远大抱负，在田园牧歌中琴书自娱,过起了“ 羲皇上人 ”(即远古伏羲氏时代以上的人)般返璞归真的生活,这也许正是儒家“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的处世哲学在他生活中的具体体现吧。

诗人出于对自然、对田园的喜爱,还自号“ 五柳先生 ”,并作《五柳先生传》以言心志：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祥其姓字，宅边有五棵柳，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 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赞曰 黔娄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酣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黔娄为古代隐士，无怀氏、葛天氏都是传说中的上古帝王。由此可见，诗人将近而立之年仍未出仕，虽有时局不良因素外，也是其淡泊名利的心性使然。生活贫困，诗人“ 晏然 ”，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愿意过远古返朴归真的生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

诗人毕竟有“奉天地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感士不遇赋》）的信念，加上目睹社稷苍生的苦难，诗人的内心颇不平静。于是，孝武帝太元十八年（公元 393 年),诗人在 29 岁的时候，决定暂时告别田园，踏上仕途。

作此选择，生活困顿也是重要原因。诗人在《饮酒》诗中自述道：

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因缠己。

身为大丈夫却无力使母亲安度晚年(“将养不得节”),自然使诗人颇感不安。于是，诗人就接受了江州刺史王凝之的征辟，担任州府祭酒。

但是，仕途生活并不快乐。诗人恬淡坦率的性情，使他受不了做小官时那种拘束和折磨。不数日，他便“不堪吏职”，辞职归田了。此后不久，他又推辞了州府让他做主簿的征辟。

这样,他在田园里又闲居了六年,“躬耕自资”。

这六年中，政局发生了较大变化。昏聩的孝武帝被宠妃张贵人用被子闷杀，继位的安帝司马德宗却是个白痴，口不能言，不辨寒暑饥渴，连吃饭穿衣也不能自理。出了这样一个宝贝皇帝，朝中大权自然完全被司马道子一伙把持，朝政更加黑暗腐败。东晋政权本来就是世家大族们的联合体，好比现在的股份公司，司马皇室只不过是董事会的董事长罢了。像董事会成员之间时常争斗那样，世家大族之间争权夺利，甚至觊觎皇位，是其痼疾。谢安时代董事会成员团结御敌的局面很快消失后，某些大族便蠢蠢欲动，不服从皇室统治的现象时有发生。隆安元年（公元 397 年),兖州刺

史王恭，联络殷仲堪作乱，再次揭开了内乱的序幕。

被谢安制服了的野心家桓温的儿子桓玄，借平定王、殷叛乱之机，迅速扩充自己的实力，想要重温乃父未竟的帝王梦。也许顾及桓家与陶家的世交，隆安三年，桓玄征辟陶渊明入幕。

也许再次为生计所迫，诗人应征到桓玄手下做事。所担任职务,现已乏载,由其后来‘不为好爵萦’的诗句看来,这个职务不低。

一开始，诗人并不了解桓玄的野心。入幕之后，诗人逐步认清了桓玄的真面目。桓温虽为野心家，却还有统一中原的雄心。桓玄徒有乃父野心，却无乃父的壮志，只汲汲于个人的私欲。再加上朝廷从上到下的黑暗腐败，正直的陶渊明感到深深的失望，并为自己匆忙应征的孟浪行为而深深地后悔了。诗人曾受命从桓玄的老巢荆州,出使京师建康(今江苏南京)。在从建康回荆州的路上,诗人痛苦地吟道：

> 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夙好，园林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指茅屋）下，庶以善自名。
>
>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

“商歌”，指春秋时齐人宁戚想从政时所唱的歌，此处指出仕。说到做到，隆安五年冬天，诗人借母亲病故之际，脱离了桓玄幕府的羁绊,回乡‘耦耕”。是年,诗人 37 岁。

再次归隐后,为生计所迫,诗人在《癸卯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中写道,他已无法顾及孔子‘忧道不忧贫’的教训,清晨赶着牛车,做起真正的农夫来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秉耒’生活,带给诗人的是清新、欢快的感受。“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不仅写出了新生禾苗在春风中欣欣向荣的景象，更洋溢着诗人看到自己劳动初出成绩时那种迫不及待的喜悦心情。

晋安帝元兴二年（公元 403 年）冬天，桓玄终于篡位了，国号楚，把晋安帝流放到诗人的家乡江州。诗人虽感于朝政黑暗而不愿出仕，但他对父祖效命的晋室还是颇有感情的。诗人赋诗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寝迹衡门（柴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凄凄岁暮风，翳翳经夕雪。……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

——《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

自然的寒风冷雪，不正是时局的象征吗？诗人在寒冷的冬季，“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确为古代尽忠报国的仁人志士所激动。可现实中报国无门，诗人只好在贫困中紧闭柴门，固守节操，不与乱臣同流合污了。

时局的变迁，又为诗人提供了出仕报国的机会。

元兴三年二月，北府兵将领刘裕联合朝野反桓力量，在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伐桓玄。三月，桓玄兵败出走，把晋安帝从江州劫持到了江陵。刘裕兵入建康，被文武大臣推举为镇军将军，都督八州军事、徐州刺史，继续统军讨伐桓玄。

刘裕进入建康后，作风也颇不平凡。他以身作则，整顿朝纲，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二三日间，风俗顿改”。刘裕也许对及早脱离桓玄的陶渊明有好感，就征辟其为参军。

可能对刘裕抱有幻想，诗人就再一次告别田园，入幕镇军将军府中。此时所作《荣木》一诗的卒章，反映了他此时的心声：

先师遗训，余岂之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

孔子曾说“四十、五十而不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因而诗人对年届 40 才获得建功立业的机会，仍然欣喜。决心驰骋千里，以展才智。

但是，入幕以后，诗人便发现，刘裕也是一个排除异己、积极积蓄个人势力的野心家，假以时日，必定又是一个桓玄。犹如兜头浇了一盆冷水，诗人的希望破灭了。数月后，他便托故离职，重回家乡柴桑。

这时坐镇江州的建威将军刘敬宣，慕诗人贤名，又征辟其为参军。诗人推脱不过，只好再次入幕。

其实，诗人的内心十分痛苦。诗人认识到，自己为社稷苍生立功的抱负，实在难容于黑暗的朝政，搞不好还会成为野心家与权贵们争权夺利的牺牲品。看来，恬淡的田园生活，才是自己的最好归宿。于是，义熙元年（公元 405 年）春天，诗人又辞去建威参军的职务，再次回归田园。辞职前，诗人曾出使江都。途中，诗人写道：

> 余亦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
>
> ——《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

混迹污浊的官场，诗人认为像受到捆缚一般难受。为了使“素襟”不受玷污，为了保持“霜柏”一般的节操，诗人才重新回归梦绕魂牵的田园，寄情于自然。

不过，诗人的经济状况更加不乐观，以至“幼子盈室，瓶无储粟”，诗人只好违背本愿，在亲友的帮助下，于这年秋八月，出任彭泽县令，以求微薄的官俸，聊充“三经（指隐居）之资”，即为长期隐居做点物质准备。

彭泽县在彭蠡泽之东岸，与诗人的故乡、湖西的柴桑县相去不过百十来里路程。县里有公田三顷，收益归县令。诗人嗜酒，因而

准备悉令种秫（糯米之类）以备酿酒，且言“吾尝得醉于酒足矣”！诗人的妻子为家计考虑，坚持种秔（大米之类）。夫妻二人几经争论，最后决定两顷半种秫，半顷种粳稻。

然而,时局多难,百姓负担异常沉重。作为县令,职责所在,必定成为朝廷盘剥、压迫百姓的工具，这大违诗人本性。加上官职低微,在官场应付中多须卑躬屈膝,这令生性清高“质性自然”的诗人更加苦恼。上任不久,诗人便为这种“口腹自役”的行为,而“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了。

不过,为了“三径之资”,诗人原打算公田收获一番后再辞职归隐。十一月份，郡里派督邮来县里视察，便发生了本文开篇所叙那一幕:“不为五斗米折腰”,诗人宁愿辞去县令,放弃求“三径之资”的想法而从此穷守田园，也不愿再向权贵、向浊世卑躬屈膝的清高气节，备受后人敬佩。宋代理学大师朱熹对诗人的评价，颇为中肯“: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淡,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所以高于晋宋人物”(《朱子语类》)。

从 29 岁出仕做州祭酒，至 41 岁辞去彭泽县令，诗人几经仕隐，既为生活所迫，也为理想所激励。他最终选择归隐田园，既是其淡泊名利的本性使然，也可视作其对浊世无声的抗议。

归田园前，诗人心情颇不宁静，就挥翰写下了千古传颂的佳作《归去来兮辞》。

辞前有序，叙述的是其为官彭泽的经过。辞的开端，诗人恢复了本真的心灵便兴奋地呼唤道“: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他觉悟到了为口腹自役的错误“: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在摆脱了名利的枷锁之后，诗人的心情十分欣然，他以轻快的笔调，幻想了自己回归田园的经过 起程时“;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临门时“;僮仆欢迎,稚子候门”回家后“;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曰涉以成趣，门虽设

而常关”;抚孤松而盘桓”;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躬耕之余;或命巾车(有车衣的车子),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

幻想着田园牧歌的乐趣，诗人远离污浊官场的心愿更坚定了；“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诗人只愿在‘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的淳朴生活中乐享天年。

这篇文章，文思如行云，字字皆从肺腑中流出，丝毫不见斧凿痕迹，可视为诗人与污浊官场告别的宣言，因而备受后人激赏。宋代文学大师欧阳修评价该文时所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不为过誉。

诗人在归田园后的次年,又写下了组诗《归田园居》五首,进一步对往事作了总结，也表达了对田园生活的真爱。其一曰：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是一幅何等淳朴快乐的田园风光画卷！无怪乎诗人要后悔13年的‘尘网”“樊笼”生活,从此投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之中了。

其三曰：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首诗，描述的是诗人躬耕一天的体验。劳动虽然艰辛，诗人的心情是充实和舒畅的。他最大的希望，是一分辛劳能有一分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获。可见，诗人已融入到普通劳动者之中，这从其余三首诗中所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近邻)。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无旭”，可得到印证。

诗人的躬耕生活，就这样开始了。诗人诗歌的内容与风格，也从《归田园居》开始,发生了鲜明的变化。

“躬耕未曾替,寒馁常糟糠”

在归隐的最初两年，陶渊明边耕边读，生活虽不宽裕，温饱尚无忧虑。但在归隐第三年发生了一场火灾后，诗人的生活开始变得异常艰难。

义熙四年(公元 408 年),诗人的田庄意外失火:“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诗人钟爱的茅屋及屋前屋后的榆柳桃李在这突如其来的灾祸中化为灰烬，一家老小只好寄居在门前小溪的扁舟上。直到秋天，才在废墟中又搭起几间茅屋，往日的温馨与恬淡，已随着烟火而飘逝了。

不仅这场大灾给诗人带来了巨大打击，胞妹与从弟相继过世后,收养前者的‘藐藐孤女’与后者的‘呱呱遗孤”,更给其并不宽裕的生活带来了沉重压力。连老天爷也助纣为虐：“炎火屡焚如，螟蟘姿中田 风雨纵横至,收获不盈廛。’再加上时局动荡,兵荒马乱，诗人在此等天灾人祸的重压下,尽管抱着‘力耕不吾欺’的愿望,年年‘耕耕未曾替”,却仍然‘寒馁常糟糠”。50 岁以后，竟然发展到“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乃晨愿乌(金乌,指太阳)迁”这等饥寒交迫的境地。甚至，诗人要乞食以解暂时的危难：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

——《乞食》

这对清高的诗人来说，该是何等痛苦的心灵煎熬！好在主人好客,对其热情馈赠,诗人只好“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了。

在此等恶劣环境中，加上病魔缠身，诗人过早衰老了。40 岁以后,已经“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弱质与运颓,玄鬓早已白”,看上去像一位银发飘然,面目清癯的皤皤老者了。因而,诗人也常为死亡担忧了:“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五十岁曰“衰”),从古皆有没,念念心中焦。”

可贵的是，诗人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为口腹而自役，重新踏入仕途以改善生活环境。在诗人隐居后，刘裕不仅消灭了桓玄，也逐步翦除了朝中异己势力，晋安帝已成了其手中玩弄的木偶。他也在积极积蓄力量，为篡晋做最后的准备。感于诗人的贤名，刘裕曾两次以东晋朝廷的名义，征辟其为清闲的著作郎，都被诗人毫不犹豫地谢绝了。他不愿玷污自己的气节，去做装饰黑暗朝政与野心家们的珠宝。他在组诗《饮酒》之九中,摹仿屈原《渔父》篇的笔意，假托一位好心的田父上门劝仕遭自己拒绝，以向世人表达自己躬耕隐居的决心：

> 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襁缕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同流合污)。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已讵非迷（违背本性岂非陷入迷途吗）!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

为了向世人进一步表明自己决不“纡辔”(回车改道,指重新入仕)的决心,诗人又写道：

>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

真意，欲辨已忘言。

——《饮酒》之五

诗人安贫乐道，丝毫不尚慕车马喧嚣的庸俗生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不仅写出了隐居生活的恬淡闲静,更重要的是以经霜不屈的菊花喻人，显示了诗人绝不与浊世同流合污的高洁情怀。这句诗清新自然，从此赋予菊花以高洁隐士的象征，后人因而尊诗人为十二月花神中的九月菊花之神，也有直接以“陶渊明”代指菊花的。据记载，明朝名儒陆平泉初入史馆时，因事与同僚去见奸相严嵩，众人争先恐后地上前献媚。观此丑态，陆平泉看到庭中陈列有多盆菊花,就冷冷地说道:“诸君且从容些,不要挤坏了陶渊明!”语中带刺,精妙异常,令趋炎附势之徒着实汗颜。

所幸的是，对诗人这种高洁情操表示欣赏者也不乏其人，其中包括与诗人一同劳作的村农野老。也许是拒绝了朝廷著作郎的征辟之后,诗人在《饮酒》之十四中写道：

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铺垫杂草权当坐席）坐松下，数斟已复醉。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与知己欢饮，诗人心灵得到颇大慰藉。

诗人归隐，乃迫于朝政黑暗不得已而为之，并非完全出于本愿。少壮时的雄心仍时时在他心里激起波澜。

《杂诗》之二，则透露了作者安贫乐道外衣下惆怅苦闷的心灵：

……欲言无余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悽，终晓不能静。

“挥杯劝孤影”,痛哉诗人！

尽管诗人内心也有过仕与隐、贫与富的激烈斗争，但他最终还是决定不与黑暗的朝政与奸邪的权贵们妥协。他曾写了一组《咏贫士》诗，借歌咏安贫乐道之士，来表明自己的心志：

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好爵吾不萦，厚馈吾不酬。……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

“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诗人这种为道献身的高尚情操，真是可歌可泣。

刘裕终于取代了晋朝，建立了刘宋王朝。对此，诗人心里颇不宁静。虽说因朝政黑暗、奸佞当道而愤然归隐，但诗人对从曾祖陶侃开始辅佐的晋朝还是颇有感情的。下面一件典型事件，可见诗人对新王朝采取的是不合作的态度。宋文帝元嘉元年（公元 424 年），权臣檀道济做了江州刺吏后，亲自到诗人家中，劝其出仕道：“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诗人答道“: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诗人不仅拒绝了檀道济的游说，在病饿很久，甚至起床都困难的情况下，还毫不犹豫地责令檀道济带回所馈赠的食物。诗人宁愿忍受借贷甚至乞讨的屈辱，也不愿食嗟来之食，其政治态度不是一目了然吗？

诗人对晋恭帝禅让后仍被毒杀感到十分愤慨，他不仅“流泪抱中怀,倾耳听司晨”(《述酒》),还写了一组咏史诗,借歌咏历史人物之际，抒发其亡国之悲和耻食周粟的气节，其中也不乏被鲁迅先生称做“金刚怒目”式的作品。如《咏荆轲》以豪放的笔调,歌咏其憎恨强暴的复仇精神。《读山海经十三首》之十则言：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

诗人热情歌颂精卫、刑天这两个不屈服于命运、敢于抗击强暴的精灵，其心志不是一目了然吗？

诗人乱也看了，篡也看了，对百姓因此遭受的苦难更有切肤之感，因而写下了千古传唱的佳作《桃花源诗》。其序文在当时堆砌词藻的骈体文占统治地位的大环境下，可以说是一篇清新的散文，因而更受后人喜爱：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通'邀')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林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 不足(能够)为外人道也。”

……

在这里，诗人假借渔人游踪，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与世隔绝但淳朴幸福的'世外桃源'。《桃花源诗》则以五言形式，对这个'春蚕收长丝，秋熟靡(无)王税'；'童孺复行歌，班(通'斑')白欢游诣'，'怡然有余乐'的幻想世界做了进一步的描述。在漫漫封建社会，这真是一个令人无限神往的世界！ ——没有暴君，没有战乱，没有压

迫，没有剥削，人人怡然自乐。这个打着儒家大同理想烙印的乌托邦，既是诗人对黑暗现实不满的反映，也是胸怀大志的诗人所希冀达到的理想世界。

怀着这种美好的憧憬，诗人度过了病饿交迫的晚年。元嘉四年(公元 427 年)深秋,诗人感到将不久于人世,遂写了《自祭文》一篇，可谓骇世之举，反映了诗人卓异之处。

在《自祭文》中,诗人回顾了贫困而坎坷的一生,对自己选择的道路没有丝毫的后悔。他还嘱咐亲友要薄葬自己于山野，“不封不树”。他既不贵生前的荣耀，更何求于死后的咏歌！最后，他把生死都看透了,发出了一声长叹“:人生实难,死如之何!”表达了诗人豁达的胸怀。这篇祭文，可以说是诗人对自己的最好总结。

十一月,在凛冽的寒风中,诗人溘然长逝,享年 63 岁。生前好友根据他一生“宽乐令终之美,好廉克己之操”,共谥他为“靖节征士”,并以“省讣却赙,轻哀薄敛”的朴素方式安葬了他。

诗人所作诗文，现存诗歌 126 首，其中五言诗 117 首，四言诗 9 首;文章包括辞赋、记传赞述、疏祭文共 12 篇。现有中华书局版逯钦立校点《陶渊明诗》通行于世。

说诗人是两晋南北朝时期最伟大的文学家当不为过。诗人以自己的人生历程和杰出诗文，铸就了一座巍巍丰碑，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影响可分为为人与为文两大方面。为人主要指其高尚的气节“不为五斗米折腰”，宁愿隐居而病饿死亡也不向权贵屈服，更不愿与黑暗朝政及贪官污吏同流合污的行为，深受后人推荐，并为后世大批士人效法。为文指他的诗歌与散文，在两晋南北朝文坛崇尚骈丽的辞赋、枯燥的玄言诗的大环境下，标新立异，显得质朴清新。尤其是他把平凡的田园劳动生活大量引入诗歌，在琐事人情，劳动感受与田园风光的叙写中倾注其对自然对生活的热爱，开创了在中国文学史上占重要地位的田园文学，卓然而自成一派宗师。他的作品泽被百代，影响极其深远。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